

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丛书

董泽芳 总主编

智慧与创造：“新钱学森主义”与“动力学的高等教育学”

杨杏芳 罗元云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丛书

董泽芳 总主编

本书为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课题一般项目“横断综析的大成智慧工程与大学学科壁垒的融通”资助成果

项目批准号: 12YJAZH176

本书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提供的出版基金全额资助

智慧与创造：“新钱学森主义”与“动力学的高等教育学”

杨杏芳 罗元云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智慧与创造：“新钱学森主义”与“动力学的高等教育学”/杨杏芳，罗元云
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6
(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丛书)
ISBN 978-7-5622-7016-4

I. ①智… II. ①杨… ②罗… III. ①高等教育—研究—中国
IV. ①G6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 120987 号



智慧与创造：“新钱学森主义”与“动力学的高等教育学”

© 杨杏芳 罗元云 著

责任编辑：王中宝

责任校对：王 胜

封面设计：罗明波

编辑室：学术出版中心

电话：027-67863220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 152 号

邮编：430079

电话：027-67863280/67863426(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apress.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印刷：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王兴平

字数：339 千字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8

版次：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9.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总 序

高等教育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子系统，它与经济、政治、文化等子系统之间有着相互依存的联系。高等教育作为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的社会活动，与人的发展更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同时，高等教育自身又是一个多层次、多类型、多主体的系统，不仅大学之间，大学内部各组织之间，领导、教师与学生之间关系错综复杂，而且与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时代的发展，多层次的高等教育与多元化的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也越来越密切。现代社会，高等教育的存在和发展越来越离不开政府和社会在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政策、环境等方面的支持与促进；社会的发展也越来越离不开高等教育的引领与推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高等教育对许多国家发展的实际影响来看，高等教育已成为促进科技振兴、经济发展、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的必要条件；从高等教育对社会个体的影响来看，高等教育不仅是提高个人素质、开发个人潜能的重要基础，更是促进社会流动、实现人生价值的主要途径。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社会现象与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关系时发现，因知识成为经济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资源与生产要素，高等教育就逐渐从游离于社会之外的“象牙塔”融入社会的边缘，并将日益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心要素，从而提出了著名的高等教育“从边缘走向中心”的理论。的确，高等教育对社会及个人的影响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巨大，社会变革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

然而，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科学文化内含的经济价值和工具价值得以彰显，高等教育发展中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冲突日趋激烈。同时，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加快与政府、市场、大学三者关系日益复杂，以及财政困难，商业化、官僚化、技术至上和教育质量下降等问题凸显，高等教育发展的现状和社会的期望之间的鸿沟逐渐加深，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冲突也不断加剧。著名的高等教育学家的约翰·S. 布鲁贝克在其《高等教育哲学》一书中，专门从冲突论的视角，除主要论述了高等教育发展中认知论与政治论、自治与控制、学术自由与社会责任、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普通教育与专才教育等五方面的冲突外，还就传统的高等教育与现代的高等教育的冲突、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道德的冲突、大学与教会的冲突等方面的问题展开了论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长费德里

克·马约尔在1995年发布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高等教育的变革与发展的政策性文件”中就指出，“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高等教育都处于危机之中”。

在我国，随着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人们已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高等教育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与协调发展不仅是政治稳定、科技振兴、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人民幸福的必要前提，而且是保障高等教育健康发展、高效运行的基本条件。然而，现实的高等教育与社会互动机制仍不够健全，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现象也普遍存在。尤其是在社会大转型的今天，新旧体制、新旧观念与新旧因素的对立与摩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失序、混乱与振荡，不仅使高等教育与社会的互动日趋复杂，也使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严重受阻。有关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的研究也面临着一系列值得研究的新问题。从宏观的层次讲，一是社会结构转型与高等教育制度的调适问题。社会转型主要是指包括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等在内的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变迁过程。社会转型必然引起与原有社会结构相配套的规则与程序不同程度的失效，而新社会结构要素的生长尚待制度创新来促进和保障。高等教育制度如何调适与创新，如何形成与各种新的社会结构要素协调发展的关系，如何实现高等教育自身健康发展与着眼于学科发展，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双重目标，必须通过高等教育社会学的研究才能作出科学的回答。二是高等教育与社会关系的变化与高等教育的社会功能重构。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必然对高等教育产生巨大的影响并使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出现一系列新变化，如市场经济的发展打破了高等教育自我封闭的格局，加强了高等教育对市场的关注；民主政治的推进提升了高等教育的自主地位，弱化了高等教育对政府的依赖；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拓展了教育者的视野，加强了高等教育同世界的联系，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重新认识高等教育的社会价值，如何重构高等教育的各种社会功能，如教育对市场经济的适应、支持与矫正功能，对政治的维护、监督与批评功能，对国外文化的选择、吸收与融合功能，等等，也是高等教育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三是教育与社会冲突的加剧与教育的整合机制。社会全方位的变革使高等教育赖以生存的基础发生了变化，高等教育本身也进入了一个剧变时期，旧的运行机制正在打破，新的运行机制尚未建立，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冲突大量存在，如社会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的人才需求结构与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输出结构的冲突，高等教育发展对投入的需求与社会经济承受力的冲突，高等教育对理性精神的追求与社会现实的功利取向的冲突，高等教育的价值观念取向与社会文化观念更新的冲突，等等。诚然，高等教育社会冲突的出现并不必然产生消极的后果。如果通过高等教育社会学的研究能够形成比较健全的教育与社会的整合机制，高等教育社会冲突就会向积极的方面转化。从宏观的层次讲，主要是社会转型带来的各种社会分化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高等教育社会

问题，如区域分化与高等教育发展的失衡问题、阶层分化与弱势群体子女的高等教育问题。急剧的社会转型使原有的社会阶层结构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分化，进而导致利益的大分化，这必然会在不同利益主体间产生广泛的矛盾和冲突，由此会引发地区之间高等教育差距扩大、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等新的高等教育社会问题。从微观的层次讲，主要有社会行为无序与大学行为失范问题、高等教育时空拓展与高校师生关系变化问题、大学校园内外环境变化与大学教师角色冲突问题、商业的价值原则渗透与大学生的功利行为问题，等等。这些现实的问题，都是令人感到困惑的新的教育问题，迫切需要对高等教育社会学的探讨。

在这种情况下，高等教育社会学理应顺应时代的要求，调整研究的视角，真正树立起高等教育与社会一体化协调发展的观念，加强对高等教育与社会互动机制的研究，努力探寻高等教育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规律，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本套丛书出版的目的在于促进这一研究。本套丛书的主要特点一是研究内容的时代性与本土性，即注重研究我国当前社会转型与高等教育变革过程中出现的高等教育与社会互动中的问题；二是研究视角的广泛性与多层性，即立足于宏观的大视野，借助于国际性新思维，综合运用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等众多学科的理论；三是研究方法的多元性与实证性，也就是遵循理论与实证研究结合、立足国情与合理借鉴结合、问题分析与对策探讨结合等原则，注重多种方法的综合运用。本套丛书的作者主要是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方向的博士，其著述多是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或博士后研究报告）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写作宗旨与要求一致，但每本书思想、风格各异。作为丛书主编，我希望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的议题能受到学界的关注，高等教育社会学能得到蓬勃发展，更希望有更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能进入本丛书系列。

由于作者水平的局限，本套丛书必有诸多不足，希望诸位学者、读者不吝赐教。在此要感谢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范军教授、副总编严定友编审等的大力支持。

董泽芳

2011年3月19日

序

27年前的1987年，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王承绪教授领衔翻译的一套《外国高等教育丛书》——《高等教育哲学》、《高等教育新论》、《学术权力》。这三本论著对当时正处在发展起步阶段的我国高等教育学科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尤其是约翰·S. 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中的许多观点、理论（诸如人们耳熟能详的高等教育的认识论哲学与政治论哲学等）成为研究者们演绎推理的重要论据。不仅如此，高等教育哲学从此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学科中的基础理论学科。从哲学的角度研究高等教育，以哲学的方法思考高等教育，寻求高等教育问题的哲学阐释，成为高等教育研究的一种范式。

不可否认，尽管用哲学方法分析高等教育的论文不时出现，但是成体系的高等教育哲学研究为数不多，以“高等教育哲学”冠名的著作则更是屈指可数。这一方面反映出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的经验性、实用性倾向，另一方面也说明高等教育哲学研究尤其是构筑高等教育哲学研究体系的艰深。

不过，今天我们欣喜地看到又一部系统研究高等教育哲学的专著面世了。它就是杨杏芳博士的力作——《智慧与创造——“新钱学森主义”与“动力学的高等教育学”》。杨杏芳博士为了提高自己的哲学修养，更好地用哲学方法研究高等教育，前几年进了武汉大学哲学博士后流动站并顺利出站，这部著作应该是她进武汉大学博士后流动站以来潜心研习高等教育哲学所获得的重要成果。

杨杏芳博士的这本《智慧与创造——“新钱学森主义”与“动力学的高等教育学”》在书名中虽然没有“高等教育哲学”这几个字，但是全书却始终贯穿着哲学的视角，展开的是哲学的分析。建立在马克思的“历史理性的实践哲学”、怀特海的有机论的“过程哲学”和钱学森的“大成智慧”的“系统科学哲学”之基础上的新钱学森主义是该书的核心所在。作者首先分析了这三大哲学与新钱学森主义的关系和新钱学森主义如何在这三大哲学的基础上综合而成；接着论述了新钱学森主义的基本观念和由“重历史理性的实践人学原则”、“重有机过程的辩证原则”、“重整体涌现性的系统原则”所构成的原则体系；最后由“新钱学森主义”导出“动力学的高等教育学”。至此完成了一个依据哲学分析与研究的新的教育学体系。

从这本《智慧与创造——“新钱学森主义”与“动力学的高等教育学”》中，我

们不仅看到了杨杏芳博士对哲学理论的深刻领悟和对高等教育现实问题的犀利批判，而且也可以体会到她的执著的研究精神。希望杨杏芳博士以这部论著的出版为新的起点，在高等教育哲学研究领域不断前行。

是为序。

胡建华

2014年6月于南京

目 录

绪论：高等教育作为“新钱学森主义”的“哲学实验室”	1
一、“钱学森之问”彰显中国高等教育“哲学的贫困”	1
二、当代中国社会的前沿哲学——走向“新钱学森主义”	2
三、“新钱学森主义”的三大哲学来源之间对话的可能性	3
四、高等教育学新的逻辑起点——基于“新钱学森主义”的“本体论重建” ...	4

上篇 重“历史理性”的人本原则与“动力学的高等教育学”的初步提出

第一章 “历史理性”与“可能世界”作为人本哲学真正的起点	15
一、“历史理性”与人类对自身的“自我意识”	15
二、哲学对历史的理性反思在于获得人类对自身的“自我意识”	18
三、“人的历史何以可能”——思辨历史哲学对历史本体的种种探寻	28
四、“生存可能性”作为历史哲学的主题和“本真的历史性”	57
五、“历史理性”中的“可能世界”内涵及其与“科学理性”的对比	94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人学观及其生存历史性的向度	98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归属与研究范式	98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根——实践的或辩证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	112
第三章 马克思“历史理性”的实践人学与“大学的可能世界”的扩张原理 ...	146
一、蕴含“可能世界”的历史理性作为高等教育的哲学基础与逻辑起点	146
二、“历史理性”的实践人学与扩张“大学的可能世界”的基本原理	147
第四章 当代大学教育活动与科研活动的历史理性批判与合理重建	154
一、大学教育活动的历史理性批判与合理重建	154
二、大学科学研究活动规范何以可能——对大学学术异化与失范问题的历史理性 批判与合理重建	161

中篇 重“有机过程”的创生原则与“动力学的高等教育学”的进一步确证

第五章 怀特海过程哲学的方法论及其核心思想	173
一、怀特海其人及其过程哲学的思想来源	173
二、怀特海过程哲学的核心观念——方法论、本体论及其基本原理	174
三、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及“钱学森主义哲学”之间对话的可能性	182
第六章 过程教育哲学与“动力学的高等教育学”的进一步确证	184
一、过程哲学的缺失与在高等教育学中的表现——“静力学的高等教育学”的主要表征	184
二、过程教育哲学与“动力学的高等教育学”的进一步确证——大学如何扩张作为“事件的可能世界”	186

下篇 重“整体涌现性”的系统原则与“动力学的高等教育学”的境界

第七章 钱学森“大成智慧”特色的系统科学哲学思想体系	197
一、钱学森系统科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197
二、钱学森“大成智慧”特色的系统科学思想体系的核心观念	199
三、钱学森的系统科学哲学体系的主要特征	208
第八章 建构“动力学的高等教育学”的一种“系统科学哲学”之路	210
一、对“钱学森之问”的解读方式决定了对它的终结方式	210
二、寻找终结“钱学森之问”的智慧之路——钱学森的“大成智慧学”的教育理想	211
三、高校“大成智慧型人才”培养的改革实践——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实验班”的案例研究	215
四、高校“大成智慧型人才”培养的划时代性意义	220
第九章 横断综析的“大成智慧工程”与大学学科壁垒的融通	225
一、中国大学学科与专业建设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225
二、中国高等教育的“科学哲学之贫困”与“静力学的高等教育学”的还原论逻辑下的片面与孤立的形而上学倾向	238

三、跨学科发展的逻辑合理性与历史必然性分析	239
四、系统论视野中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与“大成智慧型”的学科观念	247
结语	260
一、高等教育作为“新钱学森主义”的“哲学实验室”	260
二、重“历史理性”的人本原则与“动力学的高等教育学”的初步提出	261
三、重“有机过程”的创生原则与“动力学的高等教育学”的进一步确证	262
四、重“整体涌现性”的系统原则与“动力学的高等教育学”的完善	264
五、“新钱学森主义”的时代精神与“动力学的高等教育学”	266
参考文献	269
后记	276

绪论：高等教育作为“新钱学森主义”的“哲学实验室”

《迈向新高度》是钱学森先生在美国工作期间，与他的导师冯·卡门教授作为首席科学家的一大批顶级科学家们一起，为美国国防科技今后五十年的发展所作的战略规划书，它为美国谋取今天在全世界的霸权地位奠定了至关重要的科技与军事实力的基础。本书以“迈向新高度”自许，除了表达对钱学森先生的崇敬之情外，还蕴含着这样的理论思考：站在“新钱学森主义”这个代表着“新的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理高度构建“动力学的高等教育学”体系，也力图具有一种规划今后中国高等教育哲学发展路线图的战略高度。

一、“钱学森之问”彰显中国高等教育“哲学的贫困”

1. “钱学森之问”的由来

钱学森曾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①如何尽快提高人们的智能和品德，如何使大学培养的人才更好地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这是钱学森几十年来，也是我国教育工作者长期着力探索与思考的重大课题。

2. “钱学森之问”的解读方式——“回到钱学森”

科技哲学中有句名言，“观察渗透着理论”，说的是外在的任何观察都是基于内在的某一种理论背景。换言之，对“钱学森之问”的解读有浅层与深层的两种不同方式，从表层看，“钱学森之问”揭露了中国高等教育最大的渎职罪，然而从深层看，则“观察必定渗透着理论”——“钱学森之问”背后必定蕴含着钱学森本人观察高等教育现象独特的理论视角，因此，“回到钱学森”才是对“钱学森之问”真正应有的解读方式，而钱学森的全部哲学思想的理论特质就是“历史理性的科学哲学”，它不仅构成了对中国高等教育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向度，也昭示着未来的建设性的向度。

^① 李斌：《亲切的交谈——温家宝看望季羡林、钱学森侧记》，载《人民日报》，2005年7月31日。

3. “钱学森之问”与“静力学的教育学批判”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回到钱学森”不仅要深入研究钱老本人考察高等教育外在现象背后的深刻的科学哲学思想——历史理性的系统科学哲学体系，还要仔细留心钱学森本人对中国高等教育存在问题所开的处方，钱老批判中国的大学教育都是“静力学”的。换言之，“钱学森之问”与“静力学的教育学批判”是“一体两面”的关系，若承认前者就必须承认后者^①。遗憾的是，绝大多数人的眼里只有前者，没有后者，而“静力学的教育学批判”这个被绝大多数人所疏忽的地方，恰恰是最能揭示中国高等教育的症结并最终有效地回答“钱学森之问”的关键线索所在。

4. “钱学森之问”的精神实质乃是中国高等教育哲学的贫困

一般而言，教育的贫困源于哲学的贫困，因其人才观、教育观与哲学观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说“钱学森之问”与“静力学的教育学批判”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承认前者就必须承认后者，那么就可以推断“钱学森之问”的精神实质乃是中国高等教育哲学的贫困：既有历史理性的哲学的贫困，更有“历史理性的科学哲学”的贫困。

5. 中国高等教育“哲学的贫困”成为学科发展失衡状态下的“不能承受之重”

长期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发展都处于一种严重的失衡状态，与有关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汗牛充栋相比，高等教育哲学的研究却寥若晨星，更令人担忧的是绝大多数高等教育学界的业内人士仍意识不到这种失衡状况带来的严峻性后果，对我们正在做的“零售理智、批发疯狂”的行为“集体无意识”，钱学森针对这一现象发出“钱学森之问”就是明证。这种状况要予以改变，必须“回到钱学森”，立足钱学森先生的“历史理性的科学哲学”展开对中国当下高等教育的哲学基础的反思与追问。

二、当代中国社会的前沿哲学——走向“新钱学森主义”

1. 钱学森的“大成智慧”特色的系统科学哲学体系的杰出思想贡献

钱学森先生不仅是著名的大科学家，也是杰出的系统科学哲学家，他的“大成智慧”特色的系统科学体系是集其毕生之功业和实践之智慧而提出的解决复杂问题的方法论科学，它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作为最高的哲学方法论指导，其核心思想精髓包括“还原论与整体论的辩证统一”系统学方法论、横断综析的“大成智慧工程”与复杂巨系统的定性定量综合集成方法，以及基于系统论的对“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构想^②。

^① 钱学敏著：《钱学森科学思想研究》，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页。

^② 钱永刚、于景元著：《钱学森系统科学思想文选》，中国宇航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钱学森的系统科学哲学特别重视客观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及整体的协同创新，克服了近代科学还原论的局限，在整体优势与综合创新的基础上，找出从总体上观察和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从而获得高于任何一门学科的见解。钱学森的综合集成方法论是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里程碑式的贡献，是辩证思维的最高级与最复杂的表现形式，代表着当代思维科学的顶级的智慧”^①。

2. 站在巨人的肩上——走向“新钱学森主义”

为什么要走向“新钱学森主义”？有三点理由：其一，从现实的考量来看，钱学森的“大成智慧”特色的系统科学哲学体系是弥补中国传统文化的遗传基因缺陷的选择之一；其二，文化与思想进化的逻辑从来不是“罢黜百家，独尊一经”。要倡导钱学森系统科学哲学与当代其他最先进的哲学进行对话、融合与综合集成；其三，“钱学森哲学”作为科学哲学本身具有局限性，“人的世界”首先是上位的“历史理性”的人本哲学，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人学”为最高峰，其次才是下位的，能被历史理性所兼容的“科学理性”的哲学。当代除“钱学森哲学”之外，就是以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为最高峰。有鉴于此，要研究“新钱学森主义”，核心就是要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理性”、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与钱学森的“系统科学哲学”三者之间进行对话的可能性及其综合集成。

三、“新钱学森主义”的三大哲学来源之间对话的可能性

1. 怀特海“过程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人学”展开对话的可能性

两者的理论契合之处有三：都是对主客二元论的一种超越和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实体思维”的否定；都将人的世界理解为一个内在关系的整体；都将人的世界理解为一个充满创造性的发展过程。因此，两者存在着可沟通和对谈的思想空间。

2. 钱学森的“系统科学哲学”与马克思的“实践人学”之间对话的可能性

钱学森的“系统科学方法论”构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作出了基于系统科学的最新发展与完善。

综合上述，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哲学与钱学森哲学三派哲学之间完全可以构成一种对话、互释、融贯与互补的关系，而在对这三大哲学的综合集成基础上提出的“新钱学森主义”，可以代表当代新的时代精神的精华。为了解决“钱学森之问”所凸显的中国高等教育哲学的贫困问题，我们必须仔细研究“新钱学森主义”，以建构一种“动力学的高等教育学”的崭新样态，来实现对现有高等教育学的理论框架的改造。

^① 钱永刚、于景元著：《钱学森系统科学思想文选》，中国宇航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

四、高等教育学新的逻辑起点 ——基于“新钱学森主义”的“本体论重建”

从“哲学的形上之思”的内容维度上看，哲学主要是生产和提供那些最为根本性的观念和方法。哲学作为智慧之学主要体现在为各门具体学科提供元话语、元假设。哲学的方法是对各门具体学科方法的综合，哲学是真正的“学科之王”。哲学作为形上之思的魅力所在就是打破时空的有限性和局限性，以有限推知无限，以过去、现在推知未来。

高等教育哲学也应作如是观。高等教育哲学就是关于高等教育的最核心的观念和方法，借用人们评价康德的认识论上的“哥白尼革命”是“人为自然立法”的思维套路，也可以这样认为：高等教育哲学的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要为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提供元话语、元假设等前提性的根据，并高屋建瓴地引领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一言以蔽之，“高等教育哲学要为全部高等教育学立法”。

哲学的论证更多的是依靠逻辑和思辨，因此，各派哲学思想体系的争议往往表现为逻辑起点之争。任何思想体系都必须有一个严密的逻辑起点，起点不同，终点也就不同，它是任何思想体系得以建立和展开的前提和根据。

（一）对“哲学为何”的界说——“哲学就是形上之思”

亚里士多德认为，“求知是人类的本性”，而哲学作为一门超越实用目的、为知识而知识的纯粹的自由学术，引导人们把眼光投注到具体的功利目标之外，去探寻宇宙最根本的原理与原因^①。由于哲学的思辨的精神气质，故此人们也把哲学说成是守护“思”的事业。

武汉大学哲学教授何萍老师认为“本体论研究”在哲学中居于最为重要的地位，“本体论是哲学的本根”。“所谓本体论(ontology)，可概括为关于最高存在的学问。最高存在，亦即最后存在，是存在之为存在的根据。本体论以研究最高存在为目的，不仅为自己划定了研究领域，而且也为哲学厘定了哲学的世界、哲学的精神，从而确立了它在哲学中的地位。”“本体论”，成为哲学说不尽、道不完的主题，是其他任何学科都夺不去的哲学领地^②。

1. “哲学的形上之思”的形式与对象——哲学是“思想的思想”、“观念的观念”

有人说哲学的思维方式是“理性的反思”，这种说法是成立的。因为自泰勒斯提

① [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页。

② 何萍：《哲学本体重建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载《江海学刊》，1994年第6期。

出第一个哲学命题——“水是万物的本原”之时起，就终结了神话的神秘的思维方式，确立了理性反思的哲学思维方式。经过后来哲学家们的发展，哲学理性的反思方式得到进一步发展，从自然哲学用自然物质解释万物的本原进到了形而上学的抽象思维方式，用形而上的抽象概念如巴门尼德的“存在”、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范畴、柏拉图的“理念”、毕达哥拉斯的“数本原”、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等等，并运用判断、推理等形式来作本体论的探究和理性的对话。

又有人说哲学是“思想的思想”、是“观念的观念”，这种说法也是成立的。因为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第一哲学”探讨“最高的存在”、“最终的原因与依据”，“第一哲学”是“第二哲学”的前提和上位的东西。“哲学作为形而上学，必须借助于独特的范畴体系，采取的是一种‘思想的考察’。用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来说明事物之间各种本质或非本质的联系。因此哲学是‘思想的思想’，是‘观念的观念’，是在思想和观念上再现事物之间的逻辑联系。”^①换言之，从形式上看，哲学是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的思维形式进行理性的反思与对话。哲学不同于某些宗教，尤其是盲信盲从迷信的邪教。

哲学研究的对象不是现象，而是思想，且力图“使思想自觉为思想”。哲学的对象是“后天的事实”，是“以思想的本身为内容”的，是关于思想的思想，观念的观念。从哲学与各门具体学科的关系看，哲学的信念为各门具体学科提供“元话语”、“元假设”，哲学的方法是对各门具体学科方法的综合，哲学是真正的“学科之王”。

还有学者赞成黑格尔的观点，认为哲学是对“绝对的追问”^②，这种说法成不成立？笔者认为太值得商榷了。因为哲学作为“形上之思”，作为“思想的思想”、“观念的观念”是可以分为两大类型的：一种类型是关于“存在者”的“思想的思想”，另一种是关于“存在者的存在”的“观念的观念”。黑格尔认为“哲学是对绝对的追问”，无疑是从实体哲学关于“存在者”的提问方式和致思方式出发的，而在海德格尔和马克思等哲学大师那里，则是从现象学或实践哲学关于人的“存在”、“人的生成何以可能”的实践本体的提问方式和致思方式出发的。显然不能用黑格尔的实体哲学的类型阉割马克思的实践本体的另一种类型。在黑格尔看来，“哲学是对绝对的追问”，并且也存在着“绝对的真理”；但是在马克思看来，实践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性的生存样态，实践的对象化活动是文化创造的功能性的活动，对未来无限敞开，是持续不断的生成和发展，没有什么“绝对的真理”，历史理性不存在绝对，所谓的绝对只是相对，或者说有的倒是对人的理想生存状态的追问以构成对现实批判和改造的向度。

① 庄国雄著：《历史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3页。

② 张楚廷著：《高等教育哲学》，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哲学形上之思的类型是泾渭分明的，分清这两大哲学阵营是至关重要的。这也反映了哲学的不断质疑和批判的特质——“哲学是不同思想厮杀的战场”，哲学的魅力也尽在于此。

2. “哲学形上之思”的时间维度——哲学是“从后反思”

从哲学形上之思的时间维度上看，哲学是“从后反思”。所谓哲学是“从后反思”，即指哲学不是先知先觉，哲学是“薄雾(黄昏)起飞的密涅瓦智慧之鹰”。雅典娜是古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罗马军队征服了希腊，但其文化被希腊征服。“后希腊化时期”指的就是这个现象。“密涅瓦”是雅典娜的罗马语发音，本句话的意思就是哲学是爱智慧的学问，哲学就像是黄昏时分从这位智慧女神庙里飞出的鹰，而不是清晨就亮出歌喉的百灵鸟。

3. “哲学形上之思”的内容维度——哲学提供最为根本性的观念和方法

哲学主要讨论最为核心的观念和方法，从而为各具体学科提供元话语与元假设。在这里先要弄清楚观念与方法之间的关系。张楚廷教授认为，虽然观念影响方法，但方法比观念更重要，方法论比观念的地位更重要，因为观念的获得需要好的方法的指导和开辟道路。例如，结构主义哲学产生于普遍有效的“结构的方法”，正所谓“一切事物皆结构也”，而“结构的方法”被广泛地运用于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哲学及人类学等领域。布鲁纳的结构主义教育思想就是将“结构的方法”运用于教学与课程理论；皮亚杰将结构的方法运用于人的认知心理，创造出了“结构主义的心理学”。再比如，有学者把逻辑的方法夸大成为逻辑主义，马上又有学者提出要明确逻辑主义与建构主义的区别。逻辑主义追求近乎严格的决定论，探索事物的因果联系；建构主义不是追求严格的决定论，而是“创生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何萍教授在《文化哲学》一书中指出两者的区别，认为它们分别代表了自然科学的规律和人文学科的规律。也有学者将数学和几何学的“公理的方法”运用于教育学，从而创造了关于教育学的公理方法系统^①。何谓公理方法？就是那些从不证自明的前提出发而构成的最基本的命题、最基本的概念，把少数几个最关键的无证自明的命题挑选出来，作为公理，以此为基础推演出其他所有命题。公理方法体现的是一种思维收缩的方法，公理方法也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法，不过公理方法的运用体现的是理性的演绎方法。

可见，哲学产生于方法论，换言之，方法论与观念的地位是非对称的，方法论比观念的地位更高，方法论对观念常常起决定性的作用。黑格尔是方法论大师、辩证法大师，历史上也只有亚里士多德与黑格尔系统地研究过形式逻辑和辩证法，黑

^① 张楚廷著：《教育哲学》，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9页。